

# 第一章 中国人生哲学的 史前概说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的人生智慧，就需要上溯到它的源头。因此，比较全面地把握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就有必要对中国人生哲学产生之前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从哪里开始呢？得从那不知道具体年月的遥远时代开始。人们都已了解，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国的史前文化有比以往所知远为长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然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则起始于商代，因为只是从商代开始，中国才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关于此前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情况，他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对于人生的理解，除去石制工具、骨器和装饰品等实物外，可供我们藉以探求的就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和观念并曾经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有过重要影响的神话、传说和传奇。

## 神话、传说时代的生活和观念

司马迁继承父业，得读史官所藏图书，世为史官，著作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史记》。生当二千年之前的他就讲：“学者多称五帝 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而百家言黄帝 其文不雅训 荐绅

先生难言之。”孔子出生于春秋末期的鲁国，鲁国是保存古代文物最多的地方，对于古代文献，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却也只是断自唐、虞，至于唐、虞之前的情形，孔子已经不甚了了。因此，对于上古时代人类生活和观念，我们也只能是通过神话传说作一个大概的叙说。

根据《三五历纪》的说法，开天辟地者为盘古，“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纪》上也有类似的说明：“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申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而在民间的传说之中，盘古的形貌和神力则更为生动，譬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上讲：“（盘古）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

盘古之后，继起者就是三皇五帝。所谓“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上说：“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同书上载：“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兄弟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再以后，就是流传极广、材料也极多的关于那些创造人类文明始祖的传说。首先是“有巢氏”，《庄子》上讲：“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上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其次是“燧人氏”，《太平御览》上引《礼含文嘉》：“

人始钻木取火 炮生为熟 令人无腹疾 有异于禽兽 遂天之意 故为燧人。”当然还有更“神”的说法 如同书引《王子年拾遗记》所讲：“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 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 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 命燧木 屈盘万顷 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 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自此树表，有鸟若鸚 以口啄树 粲然火出。圣人感焉 因取小枝以钻火 号燧人氏。”再有就是“伏羲”和“女娲”谁是“伏羲”呢 有说他是“八卦”的发明者、还教民做网罟 如《易系辞》上说：“古者 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于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比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还有说他“教民以猎”（《尸子·君治》）；始嫁娶以修人道”（《拾遗记》）“作瑟 造《驾辨》之曲”（《楚辞》）；取牺牲以充庖厨”（《太平御览》引《皇王世纪》）至于“女娲”其功绩大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造人 如《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上讲：“俗说天地开辟 未有人民 女娲抟黄土作人 剧务 力不暇供 乃引 燧于泥中 举以为人。”此外 也有说女娲造人时有诸神相助，有助其生阴阳者，有助其造耳目者，有助其造手臂者。女娲的另一功绩是补天：“往古之时 四极废 九州裂 天不兼覆 地不周载 火 焜焱而不灭 水 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 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训》）。最后一位就是“神农氏”他是中华文化之农耕之祖和医药之祖。“神农之时 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绎史》引《周书》）就是说他教民农耕而所以为“神”农 而最为著名的还是他尝药和鞭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以赭鞭鞭百草 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 臭味所主 以播百谷。”（《搜神记》）

通常所说的“五帝”即五方之天帝“五方神”。黄帝为五天帝之中央天帝 传说在“黄帝之初 养性爱民 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冑不释……于是遂即营垒以灭

四帝。”《太平御览》引《蒋子万机论》：“黄帝战胜了四帝，于是五方之士得以安立，所谓“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淮南子·天文训》）。而黄帝与其他四帝的战争中，与炎帝之战最为持久和激烈。“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绎史》引《新书》）之后的蚩尤、夸父、刑天、共工等与黄帝之战，也都是黄、炎之战的继续，他们或为炎帝之后裔、或为炎帝之臣。

再以后就是为后世所一再称颂的古代圣王尧、舜、禹。尧是一位十分贤明的皇帝，据说他的儿子丹朱不肖，于是他就把帝位传给了德才兼备的舜。另外，古籍上还讲：“尧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以故不并一日见也。”（《论衡·说日》）也有讲是“尧乃使羿上射十日”。据《史记》上说，舜的母亲早死，其父为瞎子，娶后妻而生子名为象，几次想要杀死舜。而舜十分孝敬，三十岁时由于众人的推荐而为尧看中。舜掌理国政后出巡各地，征服蛮夷，区分国土为十二州，还治理了不少的河道。舜因为禹治水有功，也是将帝位不传子而让于禹。禹就是中国历史上夏代的第一位君王，他把帝位传于子，由此开始了世袭的帝制。夏传十七代至桀而亡于商。

以上所述的这些故事，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中华民族远古生活和观念的大概。当然这些故事，我们只能是视之为神话、传说或传奇，因为直到今天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对这些故事加以证实。这个时期我们只好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史前时代。

然而，神话、传说和传奇固然无法与所谓“正史”相提并论，它们却也决非仅仅是“不经之谈”。它们表示了原始社会人类思维的特有状况：既借助想像力征服自然和周围的环境，又把种种异己的力量拟人化，使其成为崇拜的对象。譬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体现出中国古人对自己生活环境认识过程中关于宇宙生成、地球起源的原始观念，而将认识对象拟人化后又使其成为了崇拜的对象。

而后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三材”、“三极”观念显然与神话中天、地、人“三皇”的观念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在原始人那里同样是被拟人化为人格神。它们也向我们传达着种种信息，让我们得以约略地感受到了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和思想，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所达到的智慧状态是从怎样的基地上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值得骄傲的文明其雏形又是具有什么样的面貌。譬如上面所讲的那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以及大禹治水的神话和传说，就是关于原始人类改造环境、同大自然斗争的曲折反映；而有关“五帝”的传说中黄帝与炎帝、蚩尤、夸父、刑天、共工等的战争和后来舜征服蛮夷的记载，表示的就是各氏族、部落、联盟之间的相互战争、相互兼并在政治、文化、习俗、语言方面相互混合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氏族、部落、联盟、小国渐渐地成为了较大的、更大的国家。而我们“中华民族”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地形成的。“中华”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小民族汇合而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共同生活的各族人民的总称。还有很多很多直到今天为我们所使用的观念、接受的思想，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些神话、传说和传奇中去找到最初的端倪。

## 商周时代宗教迷信概说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始于商代，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关商代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记载文字就是甲骨文字。所谓甲骨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片上的极原始的文字，而文字的主要内容则是三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史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以下一些史实中大致上可以知其大概。譬如，商王有两个相，一个叫作是巫贤，另一个叫作是巫咸。他们专门从事于沟通天神与人间的交流，他们的职位是世袭

的，并且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大事就是王事，王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在作出决断之前需听他们的建议。再譬如，根据学者们的分析，甲骨卜辞的内容可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渔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卜行止、杂卜等项。而这些实际上包括了殷商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像卜辞上记载：“甲辰，帝其令雨？”（甲辰时，上帝是否命令下雨？）《殷墟文字乙编》第 6951 片：“帝其降饗？”（上帝是否给人带来饥荒？）“伐 吉方，帝受我又？”（上帝是否保护我们对吉的讨伐？）《卜辞通纂》筹等类似的记载说明殷商人从天气变化、年成好坏、筑城到打仗、是否任用官吏都要通过占卜来做出决定。古史中曾经这样记载商汤时人们向“上帝”祈雨的情形。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上帝”在当时人生活中的威力。“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吕氏春秋》）商代帝王自诩为“天子”，承接天意来统治百姓，因此要对地上的灾异负责。商汤可算是一个幸运的君王，祈雨得雨而保全了性命。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真有点像“天方夜谈”，不过在历史上，这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不止是一次发生过。

殷商人的宗教观念是对夏代人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而夏代人的宗教思想又来源于更早的远古时代，如前述的神话、传说的时代。在此我们应该注意一个问题，殷商人的宗教思想与此前图腾崇拜、神话幻想、祖先崇拜等等还是有所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基本根据则是在于社会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据史籍记载是由两次宗教改革完成的。第一次传说是在颛顼时，他“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据说是发生在尧时，他出兵征服三苗，“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本来，“民神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通过这两次改革，结果是

百姓与神灵通话的权力被驳夺了。就是说，商王在加强其地上的统治的同时，也提高了“上帝”的地位，并独占和垄断了求神祈福的权利。

周灭殷而建立起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王国，并继承了殷商人的宗教观念。商时人们把崇奉的神称为“上帝”，认为“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上帝派其子来建立商朝，因而举凡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得经过商王听从上帝的旨意。相对来说，周人更多地讲“天命”。在周代时，设立了专门的文化官职，如祝、卜、宗、史等。所谓“祝”其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神致辞；“卜”观察征兆以预测吉凶祸福；“宗”是管理宗庙祭礼；“史”的职责是掌管文书、观察天象。由此可知，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宗教，周代人与殷商人一样迷信上天决定了人类的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周人在继承殷商人的宗教观念时，对殷商人的思想又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改革，这就是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观念。所谓“以德配天”就是说上天决定人间的一切，但是人要求得上天的保佑，还需要有好的德行去配合，所谓“丕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这一思想显然是周代人在总结夏商周三代更替历史而得到的经验教训，而其中也透露出思想本身的某种进步，即在认为上天决定人类生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作用。

商周时代的思想文化，一言以蔽之，宗教迷信、鬼神崇拜。当时掌管思想文化的主要职官，一是巫，一是史官。巫专司占卜以决吉凶，史官则专司各种昭命和策令，然后由天子依照宗教的礼节报告祖先、颁布天下。关于其时思想学术，以下我们通过“术数”、《易经》、《洪范》再作一大概的说明。

所谓“术数”是专指能预测人事吉凶祸福的方法；“术”指方术；“数”则是说国家或个人的气数和命运。据《汉书·艺文志》说，“术数”包括以下六种：一是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二是“历谱”；“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

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 凶厄之患 吉隆之喜 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三是“五行”；五行者 五常之形气也。《书》云：‘ 初一日五行 次二曰羞用五事。’ 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 推其极则无不至。四是“蓍龟”五是“杂占”；杂占者 纪百事之象 候善恶之征。《易》曰：‘ 占事知来。’ 众占非一 而梦为大。六是“形法”；形法者 大举九州之势 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畜骨法之度数 器物之形容 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以上六种术数；天文 大体上相当于人们所说的“占星术” 是通过观察星辰的运行来预言人事的祸福。“历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能推测一个朝代享国年数，再则是断定日常生活中的吉凶祸福的，这大概与后来“黄历”相仿佛。所谓“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 又指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 就是把五行相生克的原理与年、日、月、时以及五星的位置和运行相配合，来说明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的各种活动。这三者特别地体现出商周时代人们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即天文历法及各种自然现象都与人事相感应并相互影响。所谓“蓍龟”就是指卜筮，卜是通过烧龟甲或兽骨以观察其裂纹 筮则是用一定数量的蓍草排比组合，卜筮的结果就是某一卦。“杂占”是除了卜筮外的其他占卜方法，《汉书》特别说杂占中“梦为大”即后来所谓“圆梦”通过对梦境的详细解释以预测吉凶。“形法”主要是指相术 后人也称相面 其方法是根据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等推测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等 其中也包括了“风水”所谓风水也叫“堪舆”指的是住宅基地或墓地周围的风向和水流可以给人们带来吉凶祸福。

关于商周时代人们宗教生活史书上多有记载，而最为全面、集中、直接的材料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易经》。《易经》是卜筮的记录，即商周时代人们使用上面提到的术数之一“蓍龟”占卜后的记载。一般说 商代人多使用卜法 先在龟甲或兽骨上钻孔 然后灼

烧 对灼烧的结果加以说明 称为‘ 繇辞 ’。如此不断地积累 以后有相同的兆象 就可沿用原有的‘ 繇辞 ’。到了周代 人们发明了筮法，这较‘ 卜 ’来说简单易行 用蓍草排比得一卦 找到相应的‘ 辞 ’引申推论 于是《易经》又成为供卜筮之用的专业书籍。《易经》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卦和爻的说明 卦辞和爻辞 筮组成。《易经》中的六十四卦由八卦重叠而成，而八卦又是由“ — ”和“ — — ”两个符号的不同排列而成。关于八卦的起源，古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如伏羲重卦，神农演六十四卦 还有说伏羲画卦 文王重卦 周公作爻辞 孔子作‘ 十翼 ’（即《易大传》 是对《易经》最古的注释和说明），恐怕这些大都属于推测，未见得可靠。至于这本书的作用和意义，更是众说纷纭，只要我们稍注意一下今天铺天盖地的有关《易经》的各种书籍，就可知其大概。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易经》的文字极其简单、笼统 辞义异常晦奥，给后人留下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实际上，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就是以儒家思想和阴阳家、道家思想结合对《易经》作的解释 其后《易经》在两汉时被 谶纬化，魏晋时被玄学化，宋明时又被理学化，近代还有人将其混同于自然科学。我们当然不应否认《易经》中包含了多方面的思想，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研究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并且其中的确也有许多值得今人借鉴的古代智慧 但是有一点则是肯定的，《易经》就是一本卜筮之书，其基本内容就是当时人们占卜的记录。

除去《易经》外 保存在《尚书》中的《洪范》也是反映商周人生活和观念的重要文献。“ 洪 ”是大的意思；“ 范 ”是法则、规范。关于这篇文字的作者，历来人们的说法就不一。有说是周灭商后商箕子向周武王讲“ 天地之大法 ”的纪录 也有人说是成书于商末 经后人不断地补充成为现在的样子，当然也有说“ 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但不管怎么说 这篇文章反映了商周人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对后来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无疑的。

《洪范》提出了九种大法 其一是‘ 五行 ’这是宇宙间万物的基

本要素,也是宇宙间万事的根据,譬如五方、五味、五声、五色、五常、人的五脏五官等。其二是“五事”所谓“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其三是“八政”,这是讲国家的刑政,包括“食”、“货”、“祀”、“司空”(掌管工程)、“司徒”(掌管土地和人们)、“司寇”(掌管刑狱)、“宾”(礼仪外交)、“师”(统兵),其四是“五纪”,指岁、月、日、星辰、历数。其五是“皇极”,可以说是整篇《洪范》的核心,要说明的是“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其六是“三德”,即天子统治天下的三种方法:“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其七为“稽疑”,天子遇事不能决断,于是要“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其八是“庶征”,这是指出五种自然的征象,雨、炆、燠、寒、风,五者可以给人带来益处,也可产生灾祸,这就要看人是否顺天意。其九为“五福六极”,“寿、福、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福是人顺天而天给予的;“凶短折、疾、忧、病、恶、弱”六极则是人违背了天意而得到的惩罚。

总起来说,神话、传说所代表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蒙昧时代”,而在文明之初的殷周时代,我们祖先还是处于智识初开、对周围茫然无所知的条件下。在此人们十分迷信而没有什么知识,人类的周围环境以及人类自身都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们。宗教迷信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虚幻反映,它将关于人及其生活的思考诉诸权威,主要是采用信仰的方式,把人的观念、情感、活动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和神秘境界。人生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人生,即以概念、范畴和原理来解释世界和人生。根据古史的传说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我们的祖先大约在黄帝时已经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从夏开始进入到奴隶社会,而商周时代则进入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人生哲学作为一种探讨人生的意识形态,产生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可是,在商周只有宗教而无哲学,中国的人生哲学在此还处于自己的萌芽状态之中。

## 第二章 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

人们所说的具有“哲学”性质的人生观，就其发生过程而言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者是原始的宗教和伦理观念，一者是广义的“科学”，即通过观察、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活动来如实地反映对象。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活，尽管哲学在把握对象时不依靠信仰、反对诉诸权威而与宗教相对峙，哲学要求对人生有一种总体的理解、不局限于分门别类的说明而与科学相区别，但是哲学、宗教、科学它们之间却又难解难分地在人类认识历史的各个阶段上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当人们沿着哲学发展的轨迹越是向上追溯时，这三者间的联系就越加密切，甚至于在其原初形态上，三者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上一章所述神话传说及商周时代的宗教迷信，可以说是处于萌芽期的中国人生哲学所采取的基本形式。这一时期很长，开始是原始的部落社会，思想文化掌握在颯巫宗祝手里，后来进入了文明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贵族手中；开始是政教不分，后来是官师无别。掌握思想文化的人虽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很长的时期里，却只有鬼神迷信和宗教术数，此外则没有别的学问。这一情形的变化是在周王朝的后期发生的，在此，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重大变革，无神论思潮兴起，中国人生哲学开始诞生了。

## 中国人生哲学的发生

周代后期，史称春秋战国，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历史上第一次大解放时期，是哲学、科学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而得到解放的时期。首先是从“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前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人格神，但是到了周代末期，这种思想受到了怀疑和否定。

按照宗教天命论，“天”具有绝对的权威，上天保佑下民，人处于完全屈从的地位。可是在西周末年，随着周王与各诸侯国之间、贵族与平民和奴隶之间、华夏民族与戎狄等各民族之间矛盾的日益加深，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于是怨恨、咒骂天的声音出现了。据《诗经》的记载：“瞻仰昊天，则我不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斫伐四国”；“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是说我仰仗上天，可是上天竟然对我不施一点恩惠，人们长期得不到安宁；无边的苍天，你的行为没有什么规则，只是降下了兵乱和灾荒，使得四方的百姓受罪。进入到春秋时代，人们由对天的咒骂发展到了对天的怀疑和否定：“黽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馋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这是说，一个勤劳做事的人，仍不能免于别人的非议，可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上帝降下的。在公元前 524 年，宋、陈、卫、郑等国发生火灾，当时有人请郑国大臣子产用金玉石之器来祭天以消除灾祸，子产明确地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把天与人作了分别，认为天道、天命、天帝距离人都太远，与人间的火灾两不相关，还是人道是切实的。

伴随着对于天的怀疑和否定，鬼神观念也动摇了，人们的思想从鬼神的迷信下解放出来。公元前 707 年，随国将要和大国楚有一场战争，战争是国之大事，依照传统应祭祀鬼神，这时随国季梁讲：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63年，虢国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些思想虽然还没有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却已经把人与神的地位颠倒过来了。稍后的公元前645年，宋国有陨石降落，当时人们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周内史叔兴则解释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

在思想文化界，由对宗教迷信的怀疑否定，于是神权学说从根本上动摇了，而人本主义思想由此得以确立。同时而稍后，则再有思想学术从贵族手中获得的解放，这样“王官世守”垄断学术的局面被打破，知识开始普及，有教无类成为现实。

在中国的殷周时期，本来是“学在官府”，官与师不分。就是说，某个政府部门的官吏同时就是这一部门学术的传授者，所以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只有具备了某一部门官吏身份的人才才有资格讲授某一门学问。可是，随着周朝的衰败，原有的政治制度也随之逐步解体了，这样，一些原来的官吏丧失了自己职位而流落于各地，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士”（最早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产生了。这些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对社会人生问题进行研究和理论的探讨，并以私人身份为“师”而招徒讲学，形成了各种的思想体系，“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从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建立起各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中国古人对“师”尊称为“子”，因此这一时期人生理论的表现形态就称为“子学”。

先秦“子学”时代，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涌现，思想活动蓬勃灿烂。大概来讲，当时的人生哲学主要有四大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个流派中又分化出许多支派，不同支派有其基本的共同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儒家的创始者是孔丘，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重要的是思孟学派和荀况学派两大支。墨家创造人是墨翟，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道家创造者为老聃，老聃之后道家分化为两派，—

是以庄周为代表的老庄学派，一是以齐国道家为首的黄老学派。法家思想的发展分为两期，前期有商鞅和慎到为代表的两派，后期以韩非为代表。在先秦人生哲学史上，除去以上四大流派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战国时代的杨朱和告子的学说。

先秦子学中的人生哲学思想丰富多彩，其中贯穿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探讨人生问题。孔子明确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体现的是理性主义态度而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则是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老子讲：“前识者 道之华 而愚之始”（《老子》第 38 章）批判了宗教迷信 他提出的“道”作为宇宙的决定者 对于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 10 章）这显然与商周时人们所崇尚的那个有意志的造作者相区别。先秦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正如同古希腊哲学对于整个西方思想一样，为中国传统人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人生哲学，除去佛教的人生观以外，都可以从先秦的人生哲学中找到其理论上的渊源，即使是外来的佛教人生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受到了儒家和道家人生哲学思想的影响。

## 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

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在先秦子学之后，大致上经过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几个阶段。下面就分别对这几个时期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情况作一个简要的述说。

两汉时期。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终于由秦帝国建立一统天下而结束。秦焚书坑儒，造成了思想发展的大挫折。汉初，先秦各家学术仍然流行和发展而“黄老”之学独盛。“黄老”本是道家的一支，汉初的代表人物是黄生和司马谈。而至汉武帝时，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终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由百家争鸣、学术自

由到‘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实行大一统的学术专制主义的变化。于是儒学由诸子之一而成为统治者官方的正统理论。在汉代，儒学最大的代表人物则是建议罢黜百家的董仲舒。其实董仲舒虽然主张独尊儒术，其思想却是儒家与阴阳家的结合。他好讲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事。至东汉董仲舒的理论遭到王充的有力批判。上面讲过儒学在先秦只是诸子之一儒家信奉的《诗》、《书》、《礼》、《易》、《春秋》作为该学派的教科书只是和道家之《道德经》、墨家之《墨子》一样并没有后来具有的地位。可是到了汉代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这五本书成为了‘五经’。‘经’字有道路的意义又有常的意义，用它来形容一种书，是说这种书的内容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是人们全部思想和生活必须遵循的指针。汉代与经书相对者又有纬书纬书发挥经义从义理上对经义加以扩展。因此史家在讲两汉思想学术时往往称之为‘两汉经学’。董仲舒就是经学今文派的代表人物。

罢黜百家使儒学成为经学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其结果是使儒学朝神学化方面发展，并助长了宗教迷信的泛滥。本来从战国到秦汉，就有儒学与阴阳、神仙之学合流的趋势，这种使儒学的神学化是导致儒学独尊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倡导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又好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又促进了儒学的神学化。因此相对于先秦子学来说，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具有以神秘主义方式来理解人生的特征。“天”不再是自然之天，而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和创造者，阴阳也不是自然中的两种力量，而是天意的两种属性，阳表示天生成养育万物，阴则表示天惩罚万物。春夏秋冬也不再是自然界的四时更替，同样也代表了天的意志所谓：“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应就此认为两汉经学在中国人生哲学史上不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值得注意。其实，董仲舒的具有神学性质的人生哲学是儒家人生观成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正统人生观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它作为认识史上的一环，与以后人生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

系。具体说就是 它将先秦儒家提出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加以具体的落实，为儒家的人道观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天道观基础；尽管其理论体系显得粗陋，但毕竟为以后的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魏晋时期。这是中国历史的三国两晋时代。两汉时盛行神学形式的经学，这种思想在东汉时遭到了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有力批判。王充批判的矛头直指董仲舒的学说，而他在批判董仲舒的思想时使用的是道家的自然观 是引“黄老”入儒学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儒学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发展到魏晋时期，一种新的思潮兴盛起来，这种思潮反对两汉繁琐的经院哲学形式，也抛弃了对现实人生的神秘主义理解，不再追随经学对儒学的绝对推崇，表现为道家思想的复兴。不过，这种思潮也不完全是与儒家思想相对立，其实是儒道结合的一种形式。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先是有主张“贵无”的何晏、王弼 之后有主张“崇有”的裴頠 最后有提出“独化论”的郭象。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因以道家观念解释儒家思想，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因此人们称之为玄学。“玄”源于《老子》第一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用以指幽深微妙、高远莫测的“道”即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

两汉数百年独尊儒术的结果，一方面是助长了繁琐的经院学风，一方面是神学迷信的泛滥。玄学的兴起，正是对经学空洞教条和繁琐学风的批判。玄学家们菲薄礼教，提倡自然，同时行为上放荡不羁，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这一时期人生哲学思想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以虚无、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现实。王弼以“无为为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名教的批判，《杨朱篇》的享乐主义 以及同时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对人生的感叹等都反映了这一特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论到思想史上的怀疑论时，曾有如下的一段话：“在哲学史上，怀疑论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本而已。借着否

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实性，怀疑论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怀疑论者宣称，认识自我乃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为了欢享真正的自由，我们就必须努力打破把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的锁链。”<sup>①</sup> 我以为，魏晋玄学实际上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可以说玄学表现了先秦理性主义之后中国人生哲学史上人的觉醒和追求的第二个高潮。它通过对以前宣传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繁琐经术等规范、标准、价值的怀疑，表达了人们祈求摆脱外在束缚，把握真实自我的希望。因此，一概地讲玄学认识观的腐朽、没落是不全面的。而从对人生的认识历史方面来讲，玄学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最富有哲学思辨性的理论形态之一，玄学作为儒道融合的产物，对以后中国人生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魏晋玄学大盛的同时，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也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并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生哲学发展的主要潮流。佛教传入中国并占据思想史主要地位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过程。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在公元 1 世纪（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间（公元 67 年）初期）人们只是把它看成是神仙方术之一种。到了魏晋时期，佛学中的大乘空宗通过依附于玄学才真正扎下根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讲般若学的道安和慧远。这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之后僧肇（东晋人）发挥般若学派的思想，对中国佛学从玄学的附庸走上相对独立发展道路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佛性涅槃”说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布，使得佛学思想大盛。佛教经过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进入隋唐，中国佛教已经基本上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再依靠翻译过来的经典了。这时不少有学问的和尚建立了几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于是中国佛教几个有影响的宗派得以创立、发展。这就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以及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